



长征路上的琼崖儿女 担当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

谢飞： “走前”“走后”的女宣传员

■ 陈立超

深秋的陕北，一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在镜头前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短发齐耳，军装整齐，笑容明亮而从容。这张摄于延安时期的照片，如今珍藏于海南省档案馆，照片中的人叫谢飞——一位从海南文昌走出来的长征干部。照片上的她笑容干净而舒展，仿佛不曾经历过任何磨难。但若将目光从这张脸庞移开，回到一年多前的川西峡谷，你看到的是另一个谢飞：高烧数日，头重脚轻，拄着一根拐杖，在泸定桥冰冷的铁索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从铁索桥上的艰难一步，到延安窑洞前的坦然一笑，这中间隔着的，正是一段长征路。



1937年，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左二为林青）。资料图

1934年春，谢飞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出发时，要求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很多，但中央组织部经严格筛选，只挑选了30名女同志随中央红军行动。谢飞被选上，安排在中央军委卫生部，随干部休养连行动。1934年10月13日，邓颖超、贺子珍、谢飞、蔡畅、邓六金等30名女红军在于都参加集训，完成了射击等一系列军事训练。谢飞参加农军时已练过枪法，这次军训学得很快。女红军们还学习了战地抢救、护理、包扎等急救方法。按规定，每人只能携带15斤东西，其中包括5斤干粮。谢飞挑选出一条毛毯、一个挎包和两三件换洗衣服，打成背包，其余物品都送给了当地百姓。

在横跨11个省区、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谢飞与男同志们一样每天爬山越岭、过涧涉江，一天最多时要走130里路，最少也要走五六十里，有时根本无路可行，只好踏着灌丛穿过，衣服、手脚都被划破了。由于国民党军队从天上到地下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多在夜晚行军。在茫茫的黑夜里，为了隐蔽，红军只能摸黑行军，不能点起火把。夜行军极其疲倦，如果一不小心掉队，生命便有危险。谢飞有生以来从未走过这么长的山路，而且身骨瘦小，但她从未掉过队，鼓足劲紧紧跟上队伍。

长征途中，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和“政治战士”，承担着“走前走后”的特殊任务。所谓“走前”，就是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所谓“走后”，就是如果群众躲进山里，她得翻山越岭去寻找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宣传红军政策，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大部队早已出发，她又得拖着未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

在一些地区，敌人往往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在群众中诬蔑红军，致使群众害怕躲开。因此当红军半夜三更到达村子时，往往见不到人影。这时红军非常需要向群众买粮食或者找人当向导，这就需要女红军战士去寻找群众，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红军而回村来帮助红军。一次在路过广西山区一个村落时，



谢飞。资料图

天已黑，群众全躲进山里，谢飞和吴富莲、刘彩香两位女同志点上火把，逐座山、逐座岭去找，却连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她们走了一天山路，此时又累又饿，而且随时会遇上敌人，但任何恐惧也不能阻止她们的步伐，终于在第三座山上找到一个人，通过他再找到躲在其他山岭上的群众，使红军买到粮食，找到向导。经过“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省时，红军开展“扩红”工作。谢飞和一位女同志以昂扬的风度和鼓励性很强的言语深深打动围观群众，仅在遵义城一天就动员了十几人参加了红军。

谢飞除了做群众工作外，在队伍内还担负医务工作，给伤员洗伤口上药，有时找不到民夫，还要找担架抬伤员。瘦小的她总是活跃在队伍中，热情帮助同志。休养连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两三副担架，马匹多、担架多，这都是敌机投弹的目标。紧急情况下，担架来不及疏

散隐蔽，女红军们就得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还要给伤员抢救包扎。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安顺场。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20里路，上级命令3天赶到。此时谢飞已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董必武牵着小白马说：“阿香（谢飞本名谢琼香），骑上我的马。”谢飞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能撑得住。”她在战友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紧跟队伍，上山一步一步向上挪，下山两手撑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前滑。董必武看着她实在走不动了，命令她骑上小白马，谢飞骑了二三里地，又坚持下马自己走。快到泸定桥时，大雨如注，山路崎岖狭窄。有的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提议将她寄在老家。“不，只要我还有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谢飞倔强地流下了眼泪。部队过了桥两个小时之后，她才爬到桥边，往下一看，眼前直冒金星。她鼓足勇气爬到桥头，咬紧牙关，稳住心神，伏在铁索上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半个多小时后，谢飞终于爬过了泸定桥，又以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

爬雪山时，谢飞的身体更为瘦弱，没有棉衣，也没有吃的，她将组织上发下来的半斤羊毛，缝在衣服中，做成了羊毛衣服穿在身上。雪山上空气稀薄，稍一躺下休息就永远起不来了，只能脚不停步往前走。进入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后，有许多泥潭，有些同志不小心陷进去很快就没顶。在长达600余里的草地行程中，经常下雨，一些同志因此冻死饿死。谢飞把自己的青稞面分给伤员，自己挖野菜充饥。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构成了长征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据史料记载，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女同志仅有24人。1982年冬，谢飞回到家乡海南岛，在接受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海南行政区办事处同志采访时回忆：“在整整一年中，我跟随中央红军跨过了万水千山，风餐露宿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了陕北。长征是史无前例的，其艰难困苦难于言状，我作为一个弱女子却奇迹般地硬是走了过来。如果没有比本身体力更刚强的意志力，没有自觉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渡过难关的。”

林青： 电波中的『秘密战士』

■ 陈立超

1937年5月，西安七贤庄，一张合影定格了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的面孔。二排左二是一位面容清瘦、神情沉静的青年，他叫林青——彼时的公开身份是西安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照片中还有周恩来（后排左一），那是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关键时期，七贤庄的地下室里，发报机正昼夜不停地向延安传递着电波。坐在周恩来身旁的林青，并非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一位在电键与密码之间战斗的“听风者”。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海南文昌走出的红军干部，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长征路——从江西到陕北，他的武器不是步枪，而是电台。

林青，海南文昌人，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他主要承担无线电通信这一关键任务。根据史料记载，他在长征期间担任过以下与电台通讯相关的职务：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政委；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电台队长；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电台特派员。当时，电台是红军各部队与中央保持联络的核心手段。林青在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部队的电台系统中均担任要职，其工作直接关系到作战指令的传达、情报的收发以及部队间的协同，为长征的通讯保障作出了专业贡献。在长征那样极端艰难条件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线作战，林青以专业能力和政治忠诚在这一特殊战线上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